主办单位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

Organize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Urban Design

内部交流

URBAN DESIGN REPORT

06 / 2017 | 总第 9 期

城市设计通讯

住建部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刘伯英
工业遗产让生活更多彩

周 俭
城市空间的生活品质

SWA & CARBO
巴吞鲁日湖总体规划

John Friedmann
The Idea of a Pyramid of Planning Institutions Should be Avoided

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
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Urban Design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Education
2015年7月

INDEX
索引

政策法规解读	住建部 /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p.01
	中共北京市委 / 贯彻习总书记对北京总体规划讲话精神	p.02
学术研究	刘伯英 / 工业遗产让生活更多彩	p.04
	周 俭 / 城市空间的生活品质	p.06
	徐 刚 / 新型城市设计与科学管控体系	p.07
	周剑云 / 从工程建设计划到土地开发控制 —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政府职能转型的标志	p.09
城市设计案例	SWA & CARBO / 巴吞鲁日湖总体规划	p.11
专题文章	John Friedmann / **The Idea of a Pyramid of Planning Institutions Should be Avoided**	p.13
行业动态	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召开服务北京城市建设项目工作推进会	p.15
	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启帷	p.15
	2017 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召开	p.15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控规学术委员会成立	p.16
	2017 年城乡规划专业评估结果出炉	p.16
	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智力援黔”正式起航	p.16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 6 月 10 日是中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住房城乡建设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在湖北神农架启动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召开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推进会。世界遗产是最具突出价值的自然区域和文化遗存，也是人类应对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最具认同感的战略举措。2016 年 1 月联合国第 70 届大会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要求，“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今年是中国成功申遗 30 周年，1987 年我国首批 6 个遗产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30 年来，中国世界遗产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30 年来，我们坚持“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方针。通过科学规划、统一管理，有效保护了最具代表性的丹霞、喀斯特、花岗岩、古生物化石等地质遗迹，最优美的山岳、森林、湖泊等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佛教、道教、古建、耕作等人文景观，以及大熊猫等珍稀濒危物种，努力实现遗产资源的永续利用。

30 年来，我们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以及多个世界遗产国家建立了紧密联系与合作，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中国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遗产所具有的自然与人文和谐交融，体现着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丰富了世界遗产的科学价值和人文内涵。中国特色的自然遗产保护管理模式，丰富了国际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30 年来，我们坚持依法保护的原则。构建了以《城乡规划法》《风景名胜区条例》等 10 余部法律、行政法规为龙头，以 30 余部地方性法规、世界遗产地和风景名胜区专项法规为基础，以相关配套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为支撑的法制体系，认真履行《世界遗产公约》。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广大遗产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得益于国内外专家的智力支持，也得益于新闻媒体朋友们的广泛宣传！

展望未来，下一个 30 多年，将是我国实现“中国梦”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的遗产工作将大有可为，更应大有作为，为“中国梦”增光添彩。

我们要认真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担当起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历史责任：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要强化履约责任，让世界遗产的名片更加靓丽；对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提名地，要对标提质，加强培育。

我们要认真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科学谋划中国遗产事业的发展，使严格保护、永续传承的遗产理念落地生根，转化为全面推进和提升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具体实践，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推动中国从“遗产大国”迈向“遗产强国”。

我们要加强宣传引导，通过“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活动，向社会宣传展示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的珍贵价值，展示我们在保护遗产、服务大众方面所做的努力，引导全社会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遗产保护工作，营造有利于遗产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遗产事业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伟大事业，不仅肩负着保护我国珍贵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的重要使命，也是让人类财富世代相传、永续利用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要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勇于改革创新，持续办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推动遗产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章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贯彻习总书记对北京总体规划讲话精神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常委

日前，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6月2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首都建设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始终关心关系首都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包括北京新机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副中心建设、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筹办2022年冬奥会等，亲力亲为，先后主持会议研究决策。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北京城市总规编制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体现了对首都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是激励我们奋力开创首都发展更加美好明天的巨大动力。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首都工作要求上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编制好北京城市总规对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提高城市发展水平与民生保障服务的重要性，强调北京城市总规最根本的是解决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重大问题；

把握好“舍”和“得”的辩证关系，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布局；

加强精细化管理，构建超大城市有效治理体系；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把握三个关系。一是更加自觉把好“都”与“城”的关系。紧紧围绕实现“都”的功能来谋划“城”的发展，努力以“城”的更高水平发展服务保障“都”的功能。

要增强首都意识，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做到首都的规划建设始终围绕“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来开展，首都的发展自觉围绕“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来推进。

二是更加自觉把握好“舍”与“得”的关系。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来提升首都功能，提升发展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北京要靠创新发展，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要舍得“白菜帮子”，精选“菜心”，腾笼换鸟，调整结构。要加强对疏解的引导，切实为北京减重减负。通过换鸟来促提升，北京得到的是创新发展。

三是更加自觉把握好“一核”与“两翼”的关系。认清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都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环节。要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带动中心城区功能与人口疏解，并发挥对周边区域的带动作用，同时又要以实际行动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支持雄安是我们应尽之责。对愿意到雄安新区发展的在京企业，坚决支持，加强服务，决不能有“小九九”。

当前，雄安新区最需要的是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包括医疗、教育、科技创新资源等，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加强合作，见诸行动。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城市总规编制给予充分肯定，这是对我们的极大勉励和鞭策，我们要把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完善落实好。

一是将规划期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程相衔接。二是将“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落地到控制性详规。三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做好不同功能用地加减法，把握职住用地比例，适当“留白增绿”。四是守住人口天花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尤

其要坚持人口与建设规模双控，严格执行城乡建设用地实现负增长、中心城区规划建设规模实现动态零增长。适当“留白增绿”，补充完善群众生活必须的公共服务设施，这些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要认真抓好。五是加强人防设施，把人防设施与城市基础设施结合起来，实现军民兼用。

会议强调，做好北京工作，把握首都发展的要义，就是要牢固确立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不断提高“四个服务”能力水平。这些工作做好了，就是发展空间，首都可持续发展就有后劲。首都功能是覆盖全市的，“四个中心”各区都有任务，都要抓在手上。

政治中心方面，要做好中央政务功能服务和首都政治安全保障工作。文化中心方面，要加强世界遗产和老城的整体保护，精心保护好这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老城要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占比要提高，做到应保尽保。统筹推进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利用，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

国际交往中心方面，要用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服务保障成果，加强国际交往重要设施和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中心方面，要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重点抓好“三城一区”，带动十六园发展，构筑北京发展新高地。

要加强城市设计和风貌管控，加强中轴线、城市天际线、建筑高度的管理，重点区域建筑设计要严格把关，重要建筑体、街区设计方案市里要过问。

注重城市建设基调的把控，避免成为“怪建筑”的试验场。要注重环境保护，规划、建设管理部门要把好关。会议强调，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北京要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就看精细化管理水平。城市管理到治理，都要注重精治、共治、法治。

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背街小巷最能体现精细化管理水平，城市管理要向街巷胡同延伸。各区要落实好街巷长制与小巷管家，在精细处见功夫。要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管理城市，推广“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经验，并引进社会专业力量，探索多元有效的共治方式。

要坚持依法管理。北京作为首都，更要作出表率。违法建设、开墙打洞等城市乱象，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打持久战。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要坚定不移推进，在实施中又要注意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

如，补充完善群众生活服务设施，重视城市修补与街区生态重塑。要看到疏解整治是个过程，防止操之过急、工作简单化，稳扎稳打、久久为功。

会议强调，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规划一经法定程序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落实。

首规委要发挥作用，加强对规划执行的检查，加强对重要问题研究。每年都要定期进行城市体检评估。城市规划、土地、房产等部门权力大，诱惑多，一定要坚持原则，坚守底线，严格按照规划办事。

决不允许任何部门和个人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要把规划晒在阳光下，让社会监督规划实施，形成推动规划实施的合力。市纪委、市监委从现在开始，要把监督执纪问责机制向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延伸。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工业遗产让生活更多彩

刘伯英

清华大学副教授、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工业革命带来的惊喜

工业遗产和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非常年轻。工业革命从开始至今只有短短的 250 年时间，它在开始到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对我们的生活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765 年珍妮纺织机发明了以后，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纺织业从家庭作坊变成了工厂式生产。1851 年伦敦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把工业产品和生产技术在全球人的面前进行展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艺术家们也描绘了的工业革命早期的景象，梵高的《阿尔的吊桥》，讲述农业社会中工业文明的浸入，这里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圣地。

工业遗产与城市更新

工业遗产对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工业衰败之后，它们所占的城市区域进入城市更新的新阶段，城市工业用地的更新已经变成了当前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

从 2006 年到 2012 年，我们完成了首钢搬迁后的用地更新规划工作，以及之后的北京焦化厂更新。这是北京一东一西两个最主要的污染源，或者说是两个规模比较大的传统工业区。因为当时工业遗产还没有进入到遗产保护的体系里，怎么通过法规实现有效的保护？我们从这两个工业用地更新和工业遗产保护案例中，摸索出了一套把通过城市规划，实现工业遗产在法规体系下得到保护的方法——现状资源调查，制定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把保护落实到控制性详细规划里面，作为今后城市开发建设、土地出让的前提条件。从两个不同尺度的单一企业，我们又扩展到了工业区，这是石家庄的东北工业区。占地 15 平方公里，有 35 家工业企业，包括了 5 个纺织厂、华北制药厂、化肥厂、钢厂和焦化厂。

工业遗产与建筑利用

工业遗产对我们建筑师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国际上有很多知名的建筑师，在工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设计领域，完成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

伦佐·皮亚诺设计的意大利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厂改造，是一个商业综合体，包括酒店、商业、展览、会议等功能。众多知名建筑师参与设计的维也纳的煤气罐改造，是经典的工业建筑改造案例。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伦敦泰晤士河边上的发电厂，通过改造和加建变成了泰特现代美术馆。

这些明星建筑师在工业建筑改造上投入很大的精力，展现他们非凡的创新能力。德国的一个洗煤厂，现在已经变成了儿童乐园。由洗煤车间改造的大象，变成了一个蝴蝶标本的展厅。旧金山的码头仓库，现在变成了探索博物馆，仓库区变成了步行商业街。

国内也有很多前卫的明星建筑师从事着工业建筑改造的实验。META- 工作室完成的沈阳铁西区的水塔改造，虽然规模很小，探索性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面积只有 20 多平方米，没有实际的功能，强调的是特殊的空间体验。

工业遗产与环境景观

工业的遗产不仅对规划师、建筑师，对景观设计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工业生产对棕地治理都提出了严

北京首钢工业园区俯瞰图
甘振坤 摄

峻挑战。意大利都灵的 Proco Dora 工业遗址公园，原来是一个橡胶厂，当时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通过棕地修复和景观设计恢复了生机。德国的煤渣山通过环境治理和景观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已经变成了郊野公园，甚至利用坡度变成了室内滑雪场。IBA SEE，在原东德露天煤矿和焦化厂上进行环境的治理和生态修复，利用现存的场景来开展特色旅游。

工业遗产与情感记忆

对于工业遗产，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父辈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或者说浓重的情感。在共和国的光辉历史上，各条战线涌现出成千上万战斗在工业生产第一线的先进模范人物。

他们在不同发展阶段，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前列，以忘我的献身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劳动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拼搏。同时，在工业建设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包括 156 项目、三线建设等，很多影视作品都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当这些工业生产退出生产，走向衰败、重组，很多人经历了下岗，陷入到生活的窘境，也有很多影视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情感。

现在很多工业博物馆开始建设，很多工业企业也建立了自己的纪念馆。大量的工业设备原来被当作废品处理掉，如今，这些设备已经变成了工业文物，进入到博物馆里。

这样的现状也给我们文物保护人员提出了新的课题，比如如何保护钢铁设备？同时对于工业档案，原来都存放在企业里，当企业不再存续、消失之后，这些档案怎么办？

现在这些档案也进入到了博物馆，进入到了大学的研究机构，包括企业的议事日程、股票等等。此外，很多城市也开展了口述历史的收集工作。景德镇对老陶瓷企业历史见证人和技艺传承人都做了口述历史的影像记录，打造百年陶瓷工业文化展示空间和活着的博物馆。

重钢也开始了影像记录的工程，把影像记录的成果进行了公开展览。工业遗产在记录工业建设的丰碑的同时，也记录了为丰碑的建设付出辛勤汗水、甚至是鲜血和生命的悲壮历史和事件，我们称之为“黑色记忆”，这也是工业遗产社会情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城市规划网）

城市空间的生活品质

周 俭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一、城市空间吸引与历史文化空间的价值

比照人口结构和住房价格的空间分布，可以观察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空间的分布关系。如巴黎城区居住人群分布情况，法国和欧洲人为主的蓝色区域主要集中在巴黎市中心，房价也最高；对比来看，这里更是巴黎市区百年建筑与街区的集中地区。而黄色、绿色的亚洲人集中区域、咖啡色的非洲人集中区域的房价则随与市中心距离渐远而逐渐降低。上海近年来外国居民日益增多，除了近郊的闵行和浦东，中心城区长宁、徐汇、黄浦、静安的外国人居住比例较高，也同样是上海房价最高的区域，这里更是集中了上海最为重要的历史街区。一个城市长期积淀，不仅包括了物质文明，也包括了大量的社会文明，城市的历史积淀与城市吸引力、城市空间价值，存在很大的正相关性。

二、社会资本与宜居生活

如何解释上面的现象？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社区的健康、安全、教育、经济福利、职业发展、政治参与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有助于社会的融合。

2014 年同济规划和同济社会学联合课题组做了上海 13 个居民小区的问卷调查，从信任、互惠和社会网络进行了社会资本测评。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社会资本来看，老式里弄最高，其次是新式里弄，最低是动迁安置房。从互惠性来看，差异最大，老式里弄、新式里弄排前二位，居住 30 年以上的居民之间的互惠性显著高于 5 年以下居民。从信任度来看，老式里弄邻里关系和睦程度最高，动迁安置房指标最低。我们发现较高的居住密度并非完全负面，对邻里自发交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社会网络来看，老式里弄和新式里弄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单个的老旧小区缺乏独立的管理组织机构，居民的交往范围往往超出所居住的里弄本身。总体而言，年代较久远遗产社区的社会资本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社区，同时 1500 人以下的小规模社区认同度较高，有利于积累社会资本。

三、社会空间的建构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将空间划分为具有物理形态的感知空间、概念化的构想空间、和象征性的生活空间。这些空间在现实生活情境中能动地建构关系，它既可以是环境性的空间，也可以是关系性的空间。从关系性角度来看，城市改造更新不论大小，都是一种城市空间的重构过程。

城市的规划建设，其实是对城市空间资源的重新布局，空间受益和非受益方关系全然改变。很多城市空间维护成本高，难以接近，甚至对某些群体完全区隔。如果城市公共空间的共享有问题，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城市空间的社会公平性不足，那就不能说这个城市空间是有品质的。规划作为政策工具，要深入考虑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这也是城市空间生活品质的基本问题。

上述提到的三个方面是关于城市空间的生活品质研究的一些视角，它们相互之间既有关联性但又不仅限于这些。我们需要认识到，城市品质是与城市居民群体和个体生活体验和获得感相关的领域，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多样性和时间性。在此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对城市空间品质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多的视角。

（文章来源：节选自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众号）

新型城市设计与科学管控体系

徐 刚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1. 城市设计：从引入推广到反思变革

在中国城镇化大潮中，城市设计探索与转型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而每个历史发展时期与中国城镇化大潮的起起落落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四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城市设计初入国内，领“风气之先”；第二个十年，内因外因共同推动城市设计本土化，可谓“风云际会”；第三个十年，行业蓬勃发展，恰如“风生水起”；第四个十年，诸多挑战接踵而来，呈“风起云涌”之势，城市设计变革适逢其会。

面对行业变革，首先对传统的城市设计进行反思，主要表现为“九重九轻”，即重规划，轻设计；重编制，轻实施；重实践，轻实证；重表达，轻研究；重开发，轻保护；重模仿，轻原创；重自我，轻协调；重设计，轻工程；重执行，轻质疑。

而相对传统城市设计，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的城市设计，需要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科学的知行理念、完备的专业构成、贴切的社会语境这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新型城市设计不再是蓝图式的一张图，它应该以人为本，从宜居乐业、公平效率、空间美学、文化传承、活力创新、生态永续等等价值观出发。

第二，新型城市设计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要具有上下统筹的知行理念，这一理念具备人文关怀，以人的体验感为视角出发，倡导多方沟通协调，研究面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并且善于运用理性的工具手段。

第三，新型城市设计在专业构成上，应构建空间技术平台来实现综合设计。

第四，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响应中央提出的“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我们的城市应追求空间正义来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应尊重多元主体的诉求，应尊重文化传承和代际公平，应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新型城市设计成为了一个由城市共同体共同主导的空间生产方式。

2. 基于新型城市设计的科学管控体系

首先，科学管控体系要有效传递城市设计的关键意图。城市设计相对于法定规划，它具有开放性的特征，随着设计者和设计对象的不同而具有很强的独特性，还具有敏锐预判未来需求的前瞻性，由此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的丰富性和探索性。

城市设计并不能等同于设计城市，终极蓝图式的城市设计是脱离现实的空想。新型城市设计的空间意图必须转化成空间语汇，方能有效地影响城市。而

城市设计的空间管控语言是城市空间生长的基因，应该是清晰的、稳定的、可通用的、可衡量的、可转译的。

其次，新型城市设计的科学管控体系需要与法定规划分工合作。对于新出台的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提出重新审视传统管控手段的设想，推动法定管控体系中的空间指标回归本源，在城市设计中予以相应的研究，如绿地率、机动车管控、配建高度、配建密度等等方面的再分析与再定位。传统法定规划不少关键性空间指标向城市设计的合理迁徙，将会推动编制、审批和管理体系的新变革。

第三，科学管控体系要规范和激励后续的创作。管控体系应形成可有效转译的管控语言，并应符合刚柔并济，底线管控，理性约束这三个要求，从而对后续的设计形成有效的指导作用。

最后，科学的管控体系需要充分衔接管理和评价体系。通过建立完善的评价和反馈体系，使城市在不断的反思中得到提高与进步。

3. 科学管控体系的八个要点

对于如何形成科学的新型城市设计管控体系，需要重点抓住八个要点：

第一，价值导向的多元化，体现以人为本，宜居乐业，公平效率，空间美学，文化传承，活力创新，生态永续等方面的城市理想。

第二，系统组织的精细化，体现分区、分级、分项的控制体系，运用包含导则、通则、专项指引等在内的综合控制系统。

第三，管控范围的全域化，不仅要包括城市建设用地，也要包含大山水、生态用地、农业用地等非建设用地。

第四，管控领域的复合化，应涵盖场地、街道空间、地下空间等建设空间以及公园、绿地、水体等开敞空间。

第五，指标设计的科学化，兼顾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具有坚实的研究支撑对接 KPI 目标管理和评价系统。

第六，管控语言的标准化，管控语言需要相对清晰、相对稳定、可通用（专业性）、可衡量（评价）、可转译（数字化）。

第七，管控手段的信息化，建立规划、建设、管理、评价多功能的数字化平台，纳入城市运行大数据、精细数据。

第八，管理事权的匹配化，妥善对接领导决策、对接行政审批、对接公众参与、对接方案评价。

最终，提出一种精细化空间管控体系的设想，以重新优化过的基本管控体系为基础，纳入地下空间、建筑设计、场地设计形成具体的三维空间管控，再纳入街道空间、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化的三维空间管控，结合城市高度、城市密度和城市色彩等等一系列的专项研究，使得空间指标更科学更系统，最后，在此框架之上再灵活搭建包含生态城市、韧性城市、海绵城市、慢行友好、绿色建筑等与城市发展目标紧密相关的指标体系。所有的这些指标体系将共同构成复合化的城市空间管控语言。

未来，这些空间管控语言可以基于大数据的平台，与智慧化的全三维、全信息化平台工具 — CIM（City Information Model）城市全息系统相互衔接，运用数字化的手段来支撑设计、建造、运营和管理的全流程，全方位实现城市空间实践的信息化。

（文章来源：节选自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从工程建设计划到土地开发控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政府职能转型的标志

周剑云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控制性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1. 城市的观念与治理体系

城市的概念与定义非常繁多，每个研究领域都有着自己的定义和解释；从治理的层面而言，城市的观念是什么？概括为两种阶段和两种类型，即：城市是扩大的建筑与建筑的聚合；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网络；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两种源头：规划建设与自由发展。

当代的政府治理体系是建构在 1949 年之后，城市治理模式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和两种模式，基本与历史类型对应：计划经济的城市观念基本上是扩大的建筑工程，治理的核心是“建设”，治理的工具是计划，管理的方式是项目，核心问题是建设项目的协调。经济能力不足，建设知识和建设人才不足是关键问题。

2.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乡规划的实质与特征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规划分为：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与空间化：具体化就是将发展目标转化为建设项目，空间化就是将建设项目落到位置和用地。详细规划是建设工程的空间安排和实施计划。

政府是城市发展的唯一主体，规划与实施是一体化的。并且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多级地方政府配合的、整体性的发展规划体系；国民经济计划是城乡发展的目标与依据。规划对象是以“建设项目”为核心的发展规划体系。

规划管理的基本特征是：规划管理属于政府内部管理的性质；属于技术协调的性质；详细规划是管理的目标和依据。详细规划就是建设项目的总平面或修建性详细规划，换而言之，今日之修建性详细规划就是那个时期的详细规划，是一个建设场地内的经济技术、甚至是美学层面的管理。

3. 改革的实质及其对城乡规划的影响

改革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改良。由“大锅饭”变成“分灶吃饭”；在农村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在城市，表现为“城市 / 企业”的混合模式。

城市发展主体多元化，发展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中央政府的发展主体分解为多个、多层级的、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发展主体；企业成为独立的发展主体和利益主体；外商直接参与城市开发过程；私人成为城市开发的主要力量。

地方层面，不同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不同政体：政府与国企主导的发展政体；市场主导的发展政体；

政府与市场合作的发展政体，混合模式复杂而显示发展的潜力与优势。城乡规划的目标发生转变：由“落实投资”转化为“吸引投资”（筑巢引凤）。

城市开发过程由计划经济的“项目 -- 用地 -- 建设”转化为市场经济的“用地 -- 项目 -- 建设”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土地的经济属性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4. 规划制度转型与传统技术逻辑的内在冲突

总规与控规的技术逻辑是“目标 -- 指标”、“规划 -- 实施”的关系。由于我国的总体规划是一定时段的发展规划，发展目标是基于预测的，也包含诉求于愿景。

其技术逻辑的内在问题是：“总体目标 -- 总体指标 -- 地块指标”的分解不是唯一的，而存在多种可能性，无法判断哪一种分解的结果符合要求：比如人口目标与控制目标的分解；“总体目标 -- 地段目标 -- 地段指标 -- 地块指标”的分解落实途径，这是一种功能分区式的分解过程，即便如此，在地段指标与地块指标之间依然存在多种可能性，比如管理单元指标与地块指标的关系。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多元主体的城市中，城市总体目标是集体共识和共同目标，目标向指标的转化，以及指标的分解都涉及利益分配，因而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而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政治过程。市场经济的城乡规划是空间资源的分配，对于新区开发，这种分配过程尚可以简化为科学过程，而对于旧城更新，由于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城乡规划就属于利益的调整过程。

5. 规划制度的建设与政府部门关系的重构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城市建设者是不可或缺的，至少城市公共设施需要政府主导建设。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具体由政府部门承担，比如教育、医疗、交通、市政、园林、环境等公共部门，这些部门是实施城市规划的主体，城市发展目标可以转化为公共建设项目，可以遵循“目标 -- 项目 -- 建设”的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发展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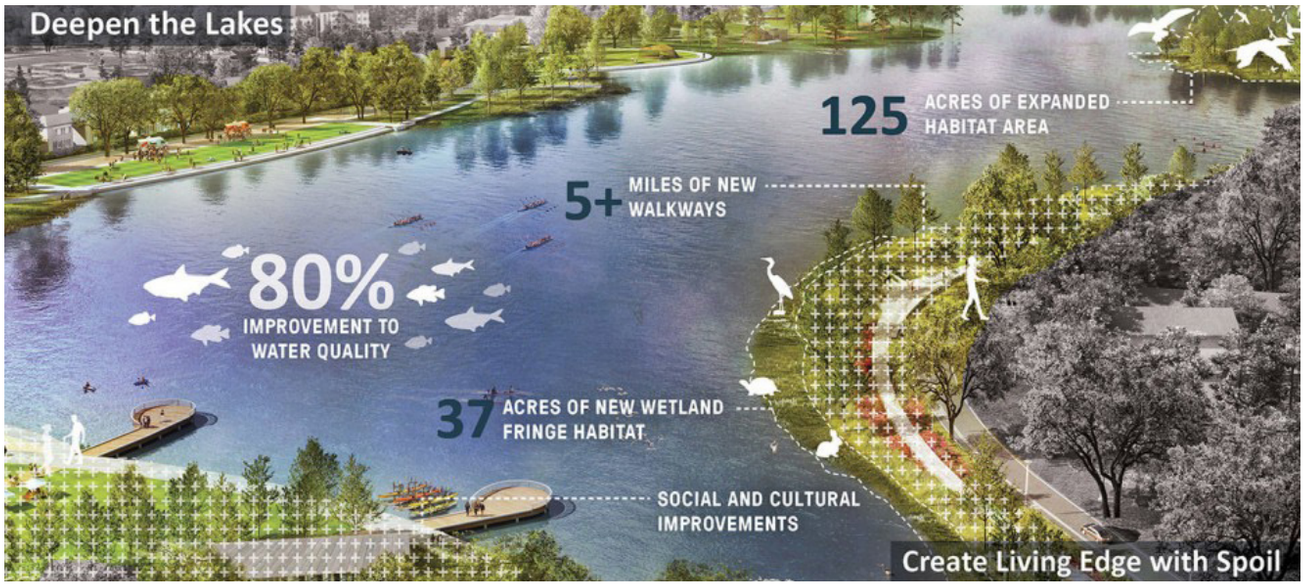
政府作为管理者就是政府提供开发控制来实现规划的目标，规划目标的实现主体转为市场主体。如何使得市场主体实现城市规划的目标，控制的方式是通过控制土地开发的方式来实现管理，而不是项目管理的方式，即不能采取“目标 -- 项目”的方式，而采取“目标 -- 指标”的方式，也就是将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工具来实现城市发展目标。政府作为管理角色的主要责任部门是城乡规划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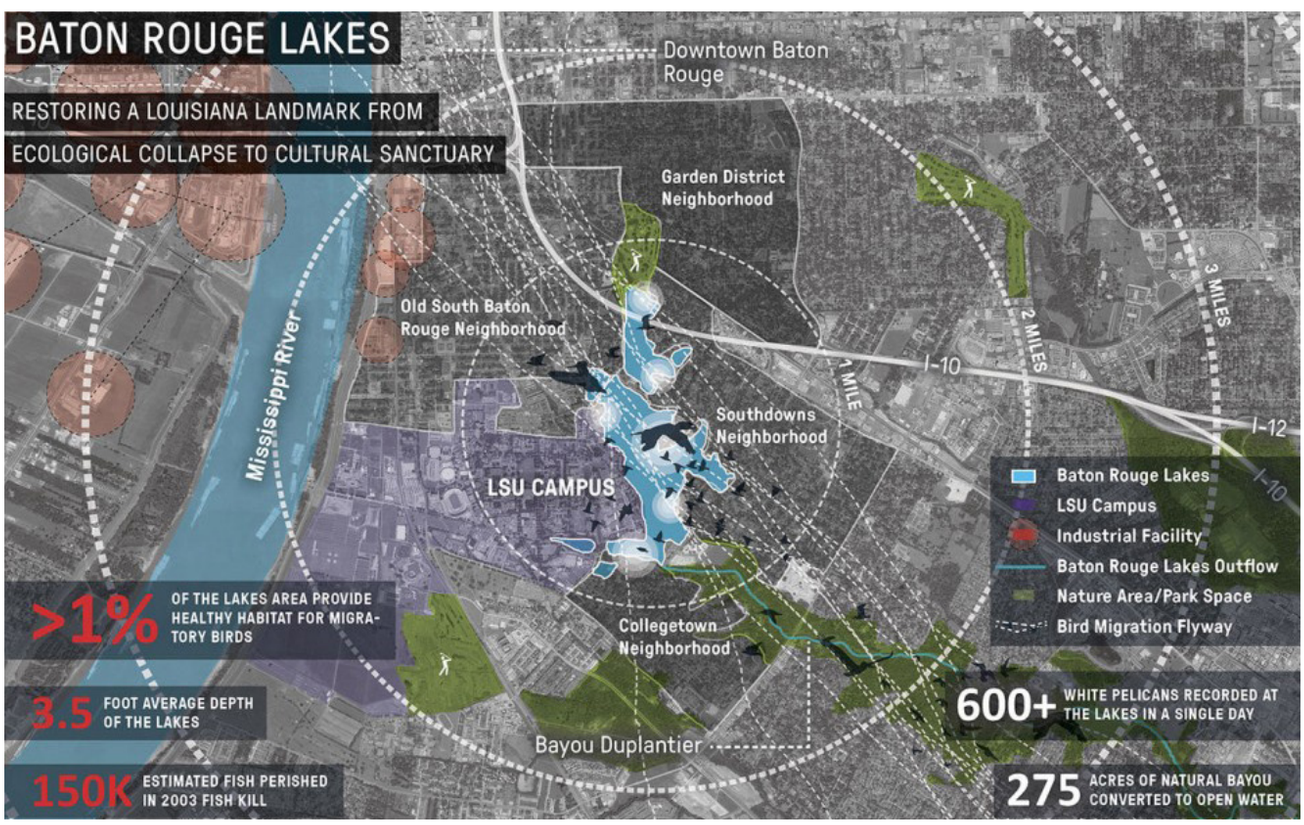
城乡规划与管理部门与政府其他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协调、协作的关系，采用控制性规划和规划许可证的管理方式是不恰当的，政府作为城乡规划的实施主体，政府公共部门是公共建设，城乡规划部门是开发控制，二者之间是平行的协调关系，甚至是公共建设引导市场建设的关系，因而，不适用控制性规划手段与许可证制度。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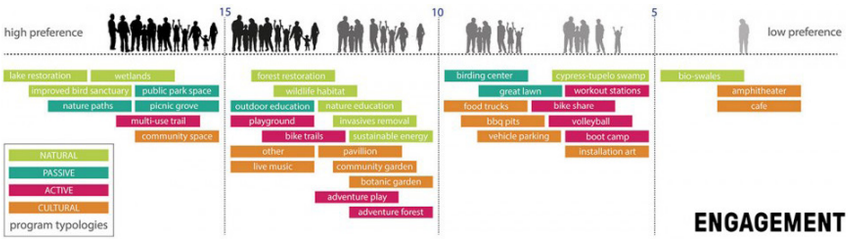
巴吞鲁日湖总体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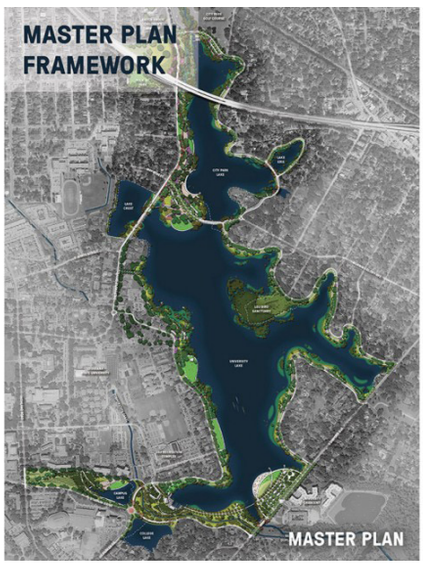
SWA & CARB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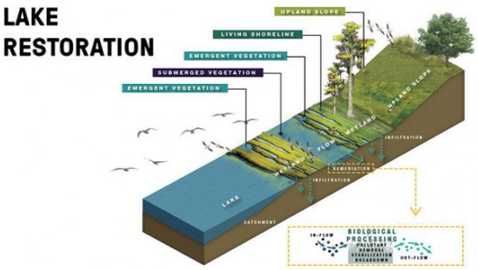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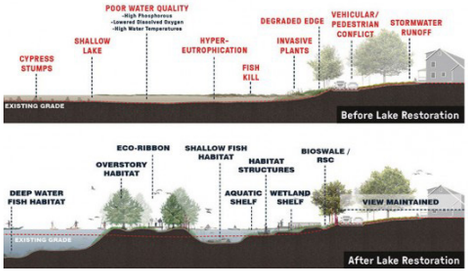


项目名称：巴吞鲁日湖总体规划
设计公司：SWA Group & CARBO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地点：美国路易斯安娜
设计目标：将路易斯安那的地标性场所从生态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并转化为文化的殿堂
获得荣誉：2016 ASLA ANALYSIS & PLANNING HONOR AWARDS









项目简介

生活在路易斯安那与巴吞鲁日的人们与水有着紧密而独特的联系。人们的生活与水息息相关，无论是好是坏，都不可分离。如今，人们正试图利用这种紧密的连接，重振巴吞鲁日城内日渐衰败的标志性水域往日的风采。

人们在危机中看到了转机，并寄望以巴吞鲁日湖项目实现新的可能性。作为路易斯安纳州首府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坚实可靠的生态修复策略不仅能让这个濒临死亡的湖区生态系统重获新生，也将让城市在生态和文化方面重新找到往日的风采。巴吞鲁日湖项目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将让城市摆脱“癌症廊道”之名，为人们找到与水共存的平衡点。

根据场地现状，设计团队为总体规划方案量身打造了数套框架系统，包括湖底淤泥的清除与放置、水质的提升、景观空间类型的增加、野生动植物栖息系统的建立、机动车与步行系统规划、场地功能的多样化、新建筑体量的增加以及照明系统、道路指示系统的完善。巴吞鲁日湖区总体规划意图在城市的心脏地带打造一个野趣盎然、风景如画的自然地带。

（文章来源：谷德设计网）

The Idea of a Pyramid of Planning Institutions Should be Avoided

John Friedmann

Founding Professor of the Program for Urban Planning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at UCLA

Keywords:
Urbanization, Mega-conurbation, Complexity Theo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rban Planning

1. Complexity Theory and Mega-conurbati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ree major urban regions emerged in coastal China. Each is composed of multiple city centers that over time have grown together. I call this process of growing together "a fusion of urban horizons," the outcome of which is a new form of the urban habitat of unprecedented size and demographic density. In English, a term for this new form is mega-conurbation. "Conurbation" is actually an old word originally coined by Patrick Geddes (1854–1932), a Scottish geographer and sociologist who is known as one of the "fathers"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He applied this term specifically to city regions that are composed of multiple urban centers.

This growing together of urban centers is not only a physical phenomenon of built-up areas but a relational one as well: over time, these city centers become interconnected through high-speed transport linkages, telephone connections, electronic devices etc. along with the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them. Fro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herefore, a conurbation begins to act as an integrated unit or system. In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PRD) is one such urban system composed of around 80 million people. The Yangtze Delta (YD), with its 30 cities, is even larger, comprising a population of perhaps 130 million. And the population of the new "super-city" of Beijing (BTH), encompassing multiple millions, falls somewhere between the PRD and the Yangtze Delta.

2. Complexity Theory and Spatial Planning

As a field of studies, urban planning has only recently become aware of "complexity theory" whose origins took shape decades ago. One of the leading theorists of urban complexity is Professor Michael Batty of the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Professor Batty is a modeler of cities, however, and urban modeling is essentially a reductive exercise, good for research but not so much for practice, which must deal with real cities and what amounts to in "real time." Planning practitioners have only recently become interested in viewing cities as complex

socio-spatial and technical systems, and most of them are located in northwestern Europe. Two well-known urban systems analysts who are also practitioners are Geert de Roo and Ward S. Rauws. They are rethinking the way planning is being done in the Netherlands by taking complexity into account. North American academic planners have so far shown relatively litt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When you say that complexity is understoo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you are of course right. As a profession, planners are late comers to this subject and so far, haven't given much thought to the study of cities as systems or more precisely, as open and adaptive system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Systems analysis either requires a reductive approach, such as in modeling, or else is overwhelmed by massive data, which take forever to sort out. There was a brief period in the 1960s, when planners—particularly transportation planners--were interested in systemic approaches to urban studies, and hence to planning. But at that time their models were hugely expensive and failed to provide reliable results. Michael Batty recently published a small article on his web page about what happened then.

He writes: "40 years ago, Douglass B. Lee published his notorious article "Requiem for Large Scale Models" i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on the demis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urban computer mod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it he identified seven 'deadly' sins of modelling: defining these relativ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cities at that time and the technologies used to implement the models as: Hyper-comprehensiveness, Grossness, Hungriness, Wrong-headedness, Complicatedness, Mechanicalness, and Expensiveness."

3. Hyper-complexity and Chinese Planning

I would more or less agree with that. As planners we can, of course, have visions of the distant future, conjuring up images of what we would like to see happen, ten, twenty, or fifty years from now. But we should not confuse these wish-images with knowledge that has scientific merit. They are no more than imaginaries of the future that may or may not inspire us to action but beyond that have little merit.

Actually, I believe that we are ignorant not just of the longer range but also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e city (and even more so,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any given mega-conurbation). A starting point for arguing in favor of this hypothesis is to ask a fundamental question: If the city is a constantly evolving open system of immense size, what can planners claim to know about the actual state of this system and its future? It turns out that virtually everywhere we look, the data available to planners is quite limited. Most of what we know comes either from recent censuses, from other public sources, or from special surveys and researches, which are rarely carried out to meet planners' needs. By the time this information falls into the hands of planners, most of itis already historical! Remember that an annual seven percent GDP growth rate as in China implies a doubling every ten years. Events happen faster than we can record them! Censuses are held every decade, supplemented perhaps by occasional sample studies from some period in the recent past. Under conditions of rapid change and non-linearity, this information quickly gets out of date. Furthermore, who guarantees the accuracy of these data? There are numerous reasons why the data planners have in hand may have very little relevance for charting the city's future. And that'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The other part is making sense of such data as you do have so that you can be confident that you have at least a working hypothesis of the city when describing its patterns and future tendencies.

I would argue that planners not only in China but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face a situation of radical uncertainty. Imagine, for instance, that you are a planner hired by the City of London. One morning you wake up, watch the news, and—wow--it's Brexit! How can you plan for a London whose future in the present perspective is so opaque? Such unanticipated events are not uncommon. And that's why I have suggested refocusing planning on the extended present, which is to say, on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t most, using such data as you have from the most recent past. Anything beyond this period is essentially terra incognita, an unknown land. Planning decisions, it turns out, are actually quite risky and on shaky grounds.

(Source: City-IF 城市规划云平台 excerpts)

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召开服务北京城市建设项目工作推进会

2017 年 6 月 19 日，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推进服务北京旧城改造、通州副中心建设工作。高精尖中心办公室主任李雪华主持会议。北京建筑大学副校长张大玉、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李春青、科技处副处长焦驰宇及相关科研团队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通州文化旅游区建设现场管理研究”、“通州文化旅游区公共绿地顶层设计”、“什刹海地区环湖沿街立面控制设计研究”3 个科研团队负责人分别围绕项目概况、国际案例分析、设计内容、阶段成果及下阶段计划进行了交流和汇报。李雪华表示各团队在研项目应比肩全国及世界优秀案例，导入前沿思维理念，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对比，结合北京实际，研究出高层次的规划设计、管理方案；希望各研究团队梳理工作经验，总结推广高精尖工作模式，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提升，以更好服务北京建设发展。

张大玉听取情况汇报后，对各团队做出的各项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学校高度重视服务通州城市建设各项工作，并将作为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展开。他要求高精尖中心办公室做好整体统筹服务、联系、监督和管理；各团队要按照通州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与项目管理方积极沟通交流，全力以赴做好项目规划设计。

（文章来源：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办公室）

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启帷

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6 月 26 日发布了“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建议书征询公告”，拉开了这个世界城市规划设计领域令人瞩目的技术咨询活动的帷幕。到报名截止时间，共有 279 家国内外单位提交了正式报名材料，这些设计机构组成了 183 个设计团队，其中包括国际、国内著名公司组成的设计联合体 67 个。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城市设计工作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的重要环节，党和国家对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主办单位将根据专家的意见，从这些报名单位中筛选 12 家左右的设计团队，参与下一阶段的工作。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17 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召开

2017 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于 2017 年 6 月 9-10 日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这是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首次在高校举办，今年也是同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城市交通领域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规划设计院、高等院校等 1500 余名代表与会，聚焦

“交叉创新与转型重构”主题，共同探讨国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下，中国城市交通未来发展方向与路径。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控规学术委员会成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控制性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成立及学术研讨会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广州艺术博物馆隆重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北京、香港、广东、福建、浙江等十多个省份，6 家规划管理部门、16 家规划设计单位、8 家规划编制研究中心、12 所高校、2 家出版社共 44 家单位的近 200 位会议代表，共同就“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法定规划”的会议主题进行探讨、学习和交流。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17 年城乡规划专业评估结果出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城乡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 2017 年全体会议近日在深圳大学召开，会议审议决定了申请评估的 10 所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或硕士研究生教学的最终等级。其中，中山大学（本科）、南京工业大学（本硕）、中南大学（本硕）、深圳大学（本硕）、西北大学（本硕）、福州大学（本科）、湖南城市学院（本科）和北京建筑大学（硕士）为复评，合肥工业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本科为初评。

委员会的委员汇报了对参加评估各校的视察意见，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了参评高校的评估结论，其中，南京工业大学、深圳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本科教育获得优秀（6 年有效期），其余均为 4 年有效期。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智力援黔”行动正式起航

2017 年 6 月 26 日，北京建筑大学、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协同中央有关部委、科研文化媒体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走进贵州实地调研座谈，这标志着北京建筑大学贵州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智力援黔”行动正式起航。这是北京建筑大学依托高精尖中心，利用科研技术优势，服务贵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一项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由贵州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牵头组织，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协同，并汇聚了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开展为期四天的实地调研，并将制定文物保护与利用人才提升计划、传统工艺传承与振兴计划，开展传统村落科学保护与利用，合作建立“试验田”，探索特色合作发展模式，开展“产学研”紧密结合，扎实推进“智力援黔”落在实处。

北京建筑大学作为本次调研的主要智力支持方，将与其它学者们一起深入花溪国家级全域文化旅游创新示范区、青岩古镇等进行考察调研，为贵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建言献策。同时，为全国传统村落及历史街区的活化和再生提供理论支撑和为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提供路径与解决方案。

（文章来源：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办公室）

主办单位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

Organize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Urban Design

内部交流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1 号
No.1 Zhanlanguan Road.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Website: udc.bucea.edu.cn
Tel: +86 10 68322519
Email: udc@bucea.edu.cn